

· 社会、人格与管理 ·

阴谋论多个变体的联系与区分*

茆家焱¹ 曾昭携² 田彩玉² 杨沈龙³ 周昊辰⁴ 郭永玉^{**2}

(¹ 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实验与应用心理学系, 阿姆斯特丹, 1081BT)

(² 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 南京, 210097) (³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心理学研究所, 西安, 710049)

(⁴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心理学研究院, 堪培拉, 2600)

摘要 以往心理学研究中所出现或测量的“阴谋论”并不统一, 导致“阴谋论”这一核心概念出现了多个变体。早期的心理学研究者倾向于将阴谋论解释为一种同质现象, 并在实际研究中将其概念化为“阴谋心态”进行测量。然而, 近年来, 研究者们逐渐放弃研究这种“稳定”的阴谋心态, 转而考察与真实事件内容相关的具体“阴谋信念”。结合最新的研究实践, 同时参考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阴谋论的进化功能理论和社会认同等理论, 从群际视角出发可以将“具体阴谋信念”再次划分为内、外群体阴谋信念这两个新的“阴谋论”变体。

关键词 阴谋心态 阴谋信念 群际视角 社会认同 存在威胁

现实世界充斥着形形色色的阴谋论, 而心理学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为什么会信奉阴谋论(茆家焱等, 2021; Douglas & Sutton, 2023)。Goertzel (1994)首次从心理学视角对阴谋论进行定量研究并发现, 人们对于内容上不相关的阴谋论的信念之间反而存在着正相关。因此, 阴谋论随之被解释为一种同质现象, 阴谋论信念也被概念化为一种“心态”, 或一种稳定的“相信阴谋会发生”的个人倾向(Bruder et al., 2013; Sutton & Douglas, 2020)。然而,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研究者结合社会上发生的真实阴谋事件, 放弃研究“稳定”的阴谋心态, 转而考察与事件内容相关的具体阴谋信念。这些阴谋信念的主题涵盖 COVID-19 大流行(Mao et al., 2021; Zhai & Yan, 2023)、美国总统大选(Wang & van Prooijen,

2023)、经济不平等(Casara et al., 2022)等。同时, 具体的阴谋信念往往受到与事件相关的社会情境的影响。学者们开始对“稳定的”阴谋心态与“动态的”阴谋信念之间的差异提出各自的见解(Brotherton et al., 2013; Imhoff et al., 2022), 对二者进行严格的区分成了首要任务。

1 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

一般阴谋心态(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和具体阴谋信念(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作为阴谋论在心理学研究中最核心的两个变体(variants), 经常被混淆使用。因此, 本文试图首先对二者进行详尽的理论辨析, 一方面厘清以往相关研究中“阴谋论”这一核心变量的内涵与延展, 另一方面探讨

* 本研究得到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202006860004)的资助。

** 通讯作者: 郭永玉。E-mail: yyguo@njnu.edu.cn

DOI:10.16719/j.cnki.1671-6981.20240611

阴谋论的心理学研究取向的演变趋势和动态前沿。

1.1 二者的定义

一般阴谋心态指个体普遍地偏好于将重大事件都归因为阴谋论的一种心理倾向 (Đorđević et al., 2021; Douglas et al., 2019; Imhoff & Bruder, 2014), 在概念上不涉及任何一件具体事件。在以往研究中, 一般阴谋心态也被命名为一般阴谋主义信念 (generic conspiracist beliefs) (Brotherton et al., 2013)、阴谋思维 (conspiracy mindset) (Sutton & Douglas, 2020)、阴谋倾向 (conspiracy predispositions)、阴谋观念 (conspiracist ideation) (Swami et al., 2011)、阴谋意识形态 (conspiracy ideology) 或阴谋世界观 (conspiracy worldview) (Douglas et al., 2019) 等。尽管命名不同, 但本质都反映了一种普遍相信世界上的事件是由阴谋引起或操纵的倾向。

不同于阴谋心态这种宽泛的怀疑倾向, 具体阴谋信念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表现为对某一条具体阴谋论的信奉, 即相信某个具体的社会事件是由某些强大的秘密团体暗中行动而造成的结果 (Đorđević et al., 2021)。

尽管从定义出发, 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存在着显著差异, 但以往的心理学者经常将这两个概念混淆或偷换使用 (Imhoff et al., 2022)。因此, 需要对二者的异同进行梳理。

1.2 二者的异同

从二者相似性的角度来说, 在实证研究中用于测量“具体阴谋信念”的条目可能由于字数限制、背景信息缺失等原因, 导致对于具体阴谋事件的描述不够详细, 从而只能传达出一种广泛的怀疑态度 (Imhoff et al., 2022)。这种怀疑态度与对“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相似。并且, 出于特定研究目的和研究设计, 研究者有时会杜撰一个特定事件以虚构具体的阴谋论 (Swami et al., 2011), 在这种情况下, 被试只能凭借一般直觉来判断该阴谋是否可信 (Imhoff et al., 2022)。这种一般直觉也与对“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相近。此外, 有的研究者还会以被试对一系列具体阴谋事件的信奉程度 (即一系列“具体阴谋信念”) 的得分取均值作为对“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 (Swami et al., 2010)。正是由于这些测量上的不规范或特殊性, 反而造成了二者之间

所谓的“相似性”, 并导致实际研究中对二者的混淆。

反观二者之间的不同, 最主要的差别还是体现在测量上。“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条目相对更抽象, 例如“出于自身利益, 许多重要信息被故意对公众隐瞒” (Brotherton et al., 2013; Stojanov & Halberstadt, 2019), 因此适用于不同的文化和样本。而“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需要依托具体事件, 可能是经典的阴谋事件, 如 9/11 恐怖袭击、肯尼迪总统遇刺等 (Brotherton et al., 2013; Swami et al., 2010); 也可能是新近发生的社会事件 (Jolley & Paterson, 2020; Mao et al., 2021); 还可能与特定社会文化背景相关, 如针对荷兰被试施测时采用“市政厅在阿姆斯特丹当地的地铁建设期间出现了腐败现象” (van Prooijen & Acker, 2015) 作为测量条目。

此外, 测量上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一般阴谋心态相对稳定 (Goreis & Voracek, 2019), 而具体阴谋信念具有“易变性” (Sutton et al., 2024)。例如, 相较于一般阴谋心态, 具体阴谋信念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改变 (茆家焱等, 2019; Imhoff et al., 2022)。Wang 和 van Prooijen (2023) 在 2020 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后通过纵向研究发现, 选民的一般阴谋心态是稳定的, 但受党派关系和选举结果的影响, 选民的具体阴谋信念会随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具体阴谋信念还可能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 并且, 具体阴谋信念在不同样本中可能会表现出文化熟悉度的差异。例如“月球登陆”相关的阴谋论对于非美国、特别是非西方的样本来说相对陌生, 继而可能产生“具体阴谋信念”在不同样本中的测量差异。

因此, “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受文化背景、时间情境以及样本的约束更少, 而“具体阴谋信念”的测量则容易受到这一系列因素的影响 (Imhoff et al., 2022; Sutton & Douglas, 2020)。正是由于“具体阴谋信念”对这些因素的敏感性, 使其更适合作为实验研究的因变量; 而“一般阴谋心态”则更适用于跨文化的研究。

1.3 二者的关系

不同学科的研究者都曾表达过相似的观点: “具体阴谋信念”源于“一般阴谋心态” (Brotherton et al., 2013; Goertzel, 1994; Uscinski & Parent, 2014)。Đorđević 等人 (2021) 发现, “一般阴谋心态”作

为个体阴谋思维倾向的衡量指标,既可以预测世界范围内著名事件相关的“具体阴谋信念”,也可以预测本土化事件相关的“具体阴谋信念”。并且“一般阴谋心态”对“具体阴谋信念”的预测力超过了政治气候的感知(如对公共机构的信任、腐败感知、不安全感)和广义政治态度(如右翼威权主义、社会支配倾向、政治犬儒主义)对“具体阴谋信念”的预测力。因此,对具体阴谋论的信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体在“一般阴谋心态”上的差异(Bruder et al., 2013)。并且,从测量的角度来说,“一般阴谋心态”也被证明是一系列“具体阴谋信念”的预测因素(Đorđević et al., 2021; Stojanov & Halberstadt, 2019)。

然而,Wang 和 van Prooijen (2023)提出,“一般阴谋心态”是一种认知风格,而“具体阴谋信念”则主要取决于情境。并且正如前文提到,“具体阴谋信念”会受到文化背景、时间情境以及样本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一般阴谋心态”可能是“具体阴谋信念”的潜变量(Đorđević et al., 2021),但不是单一潜变量(Williams et al., 2022)。换句话说,“具体阴谋信念”受到个体的“一般阴谋心态”和与具体事件内容、社会背景相关的情境因素的共同影响(Casara et al., 2022; Imhoff et al., 2022; Zhai & Yan, 2023)。

1.4 区分二者的意义

Sternisko 等人(2020)提出,阴谋论应该包括“性质”和“内容”两个组成部分。阴谋论的“性质”指的是所有阴谋论共有的特征,是对阴谋论本质的抽象概括。例如,阴谋论通常与普遍共识相矛盾且不可证伪,因此,根据阴谋论的“性质”而相信各种阴谋论反映的是个体的“一般阴谋心态”。阴谋论的“内容”指每种阴谋论中的独特成分。在不同事件中,具体的阴谋论会指控不同的阴谋对象或行为,因此,人们会受“内容”的影响而选择性地相信不同的阴谋论(Bertin et al., 2022)。“性质”与“内容”的区分在一定程度上再次反映了“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差异。因此,早期的研究者忽略“阴谋论”的这两个核心变体之间的差异,简单地将“阴谋论”同质化为一种单维的心态进行考察具有局限性。

此外,Nera 等人(2021)指出,“一般阴谋心态”由于暗示了信奉任何阴谋论都具有相似的心理机制,不能反映出“具体阴谋信念”的多样性(Harambam & Aupers, 2017),并且导致研究者们较少对信奉不同类型阴谋论的可能机制进行更深入的探索(Cichocka et al., 2016)。同时,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据表明,具体的阴谋论如果指责不同的群体对象会产生不同的、甚至相反的心理后效(Imhoff et al., 2022; Mao et al., 2024; Nera et al., 2023)。因此,当前的阴谋论心理学研究不再倾向于简单地考察“一般阴谋心态”,转而将其与“具体阴谋信念”区分,在研究中单独考察后者或同时考察二者逐渐发展新趋势。并且,这种转变悄然孕育出对多样的“具体阴谋信念”再次进行分类的趋势。

2 从群际视角划分具体阴谋信念

近年来,研究者在考察“具体阴谋信念”的前因和后效时会对其再次进行分类(Biddlestone et al., 2022; Mao et al., 2021; Nera et al., 2021; Zhai & Yan, 2023)。阴谋论经常出现在激烈的群体竞争情境中(Cichocka et al., 2016; van Prooijen & van Lange, 2014)。它可以是不同政党在选举中的斗争,比如美国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在总统大选期间激增对对手的阴谋信念(Wang & van Prooijen, 2023);可以是不同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利益的争夺,比如中美贸易战期间,两国公民相信对方国家密谋损害了本国利益(van Prooijen & Song, 2021);也可以是不同民族间一贯存在的敌意,比如反犹情绪高涨的民族往往信奉与犹太相关的阴谋论(Cichocka et al., 2016)。从概念出发,阴谋信念本身就暗含了对内、外群体的群体间分类。阴谋所指控的行动者会被描述为具有恶意并密谋行动以伤害内群体的外群体敌人(van Prooijen & van Lange, 2014)。然而,当阴谋指控的对象是自己所属的政党、国家或团体,而个人难以将自己从该内群体身份中剥离出去时,人们所感知到的则是内群体阴谋论(Mao et al., 2024)。因此,根据人们主观上感知到的阴谋对象来自于内群体还是外群体,我们认为“具体阴谋信念”可以再次划分为内群体阴谋信念和外群体阴谋信念(ingroup / outgroup conspiracy beliefs)这两个新变体。

2.1 进行内、外群体阴谋信念划分的必要性

首先,内、外群体阴谋信念可能源于不同的动机基础。Wang 和 van Prooijen (2023) 发现,在群体间冲突背景下,支持内、外群体阴谋论的动机不同,并且二者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也不同。以集体自恋为例,集体自恋与一种将外群体视为具有威胁性的防御倾向有关,通过贬损或攻击外群体来应对这种威胁。这种威胁敏感性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集体自恋可以预测对外群体阴谋论的普遍易感性 (Cichocka et al., 2016)。然而, Biddlestone 等人 (2022) 发现集体自恋与内群体阴谋信念也有关,因为高集体自恋者有更高的密谋反对典型性内群体成员的阴谋意图。尽管集体自恋与内、外群体阴谋信念都相关,但这两种关系的动机基础显然不同 (田彩玉等, 2024)。

其次,信奉内、外群体阴谋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后果。例如,信奉内群体阴谋论会降低民众的政治参与度 (Douglas et al., 2019), 但信奉外群体阴谋论反而会增加政治参与度 (Gkinopoulos & Mari, 2023)。此外, Mao 等人 (2024) 发现,信奉外群体阴谋论可以预测个体系统合理信念的上升,而信奉内群体阴谋论反而导致系统合理信念的下降。外群体阴谋信念会强化独裁主义的观点,认为世界充满威胁,因此,人们为了获得安全会服从于传统的权威 (如本国政府), 并认可对外来者的侵略 (Duckitt & Sibley, 2007)。而内群体阴谋信念则会导致人们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系统和所依赖的政府产生消极的情绪和态度,甚至采取行动挑战权威 (Imhoff et al., 2021)。因此,内、外群体的区分对于厘清阴谋信念为何具有不同动机基础和社会后果都具有重要意义。

2.2 理论根源

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 (van Prooijen, 2020)、阴谋论的进化功能理论 (van Prooijen & van Vugt, 2018) 和社会认同理论 (Tajfel & Turner, 1979) 等从不同理论视角为划分内、外群体阴谋信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 (van Prooijen, 2020) 指出,存在威胁会诱使个体产生一种努力减少认知上的不确定性以及理解外部世界的认知动机 (茆家焱

等, 2019; Douglas et al., 2017), 在认知动机的作用下,个体会寻找危机事件背后的解释,继而激发一种心理上的意义构建过程。van Prooijen (2020) 同样提出,如果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一个“敌对外群体”,存在威胁影响下的意义构建过程可能会引导人们在诸如宗教、灵性、政治意识形态等信仰体系中寻找意义和解释。然而,如果出现一个“敌对外群体”,个体则倾向于将威胁事件归咎于该群体并产生关于该群体的阴谋信念 (Douglas et al., 2017; Uscinski & Parent, 2014)。在现实中,“敌对外群体”既可能是与自己不相关的真正的“外群体”,也可能是自己所从属的,难以从其中剥离的“内群体” (Mao et al., 2024)。因此,阴谋论的存在威胁模型为群际视角的分类提供了模型支持。

根据进化心理学的观点,对阴谋论的信奉可以追溯到群体间的现实威胁,当人们察觉到群体间冲突或与之相关的社会环境线索时,就可能导致阴谋信念的增加,因此“敌意联盟”是产生阴谋论的先决条件 (van Prooijen & van Lange, 2014)。具体来说,在群体冲突的背景下,人们会更加敏锐地将具有威胁性的刺激与“敌意联盟”联系在一起。能够及时地识别出潜在的威胁对于人类的生存具有重要意义,即使有时可能会错误地放大来自“敌意联盟”的“敌意”。对于“敌意联盟”的“敌意”的识别构成了早期阴谋论产生的基础,并且能够提醒祖先及时采取行动来抵御“敌意联盟”的威胁 (van Prooijen & van Vugt, 2018)。值得注意的是,“敌意联盟”本身带有群体属性特征,因为这种“敌意”既可能来自外群体,也可能来自内群体。这也为群际视角的分类提供了证据。

Tajfel 和 Turner (1979) 的社会认同理论提出,当个体的社会认同受到威胁时,个体会产生相应的群体行为,如内群体偏好、外群体歧视和群体间冲突等,此时,外群体通常被认为是威胁的来源,人们倾向于加强与内群体的心理联系并表现出对外群体较多的负面态度 (Tajfel, 1982)。信奉阴谋论的动机和社会认同心理关系密切 (Douglas et al., 2017)。根据社会认同理论,当自己的群体处于相对弱势时会采取措施以恢复内群体地位 (Tajfel & Turner, 1979), 比如信奉与其对立的强大外群体的

阴谋论 (Casara et al., 2022)。因此, 社会认同理论也表明了具体阴谋信念是一种与强大的外群体欺骗或伤害内群体成员相关的群体间信念 (van Prooijen & van Lange, 2014), 为群际视角划分具体阴谋信念提供了理论依据。

2.3 实证发现

从实证角度来看, 不少研究通过区分内、外群体阴谋信念来探索不同变量之间的关系。例如, 个体的集体自恋水平越高, 越认可外群体阴谋论 (van Prooijen & van Lange, 2014), 而如果个体的非自恋内群体积极性 (如集体自尊和国家认同) 水平越高, 则不会产生更高的外群体阴谋信念 (Cichocka et al., 2016)。并且, 更高的威权主义、垂直集体主义和权力距离 (Nera et al., 2023; van Prooijen & Song, 2021) 水平也与外群体阴谋信念相关。从内群体角度来看, 政府作为内群体阴谋论的主要指责对象, 对政府的不信任, 低政治参与度和高集群行为意向 (Casara et al., 2022; Wood et al., 2012) 往往与内群体阴谋信念相关。更高的民粹主义、社会失范感知、系统责备倾向和较低政府代表性认同感 (Casara et al., 2022; Cichocka et al., 2016; Silva et al., 2017), 也会导致个体信奉关于政府的内群体阴谋论。此外, 研究者也通过区分内、外群体阴谋论来考察二者不同的社会影响。例如, 有研究者将与疫情相关的阴谋论在群际层面划分为指责内群体 (政府) 的阴谋和指责外群体的阴谋, 前者显著负向预测人们对政府的信任, 而后者指责疫情是由外国群体 (外群体) 导致, 因而并不会影响人们对本国政府的信任 (Bertin et al., 2022)。

以上种种理论视角和实证发现为区分内、外群体阴谋信念这两个“阴谋论”的更细粒度的变体提供了依据, 而这也反映了将“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进行区分后, 对“具体阴谋信念”再次进行分类研究的新趋势。

3 小结与讨论

阴谋论心理学这一新兴的研究领域已经蓬勃发展了近三十年。纳入心理学实证研究中的“阴谋论”这一核心变量的内涵也在不断明晰与细化。具体来说, 早期研究将“一般阴谋心态”与“具体阴谋信念”

这两个变体混为一谈, 忽视了具体阴谋信念会受到不同事件与特定情境等因素影响的特殊性。而在单独考察具体阴谋信念时, 将不同类型的具体阴谋信念等量齐观也不能满足严谨科学的实证需要。因此, 从群际视角对“具体阴谋信念”再次进行分类研究成了不可避免的新趋势。然而, 当前的工作依然存在一定的挑战。

首先, Sutton 和 Douglas (2020) 提出已有对“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可能忽略了阴谋论本身的某些心理特性。具体的阴谋论往往具有一些特征使其不如其他的解释可靠。例如, 它们一般来自不可靠、不负责任的消息来源, 并指控事件中的阴谋对象要对事件负责, 且此后不再作出回应。具体阴谋论在这种规范性上的缺陷有助于解释为什么非理性思维的指标以及认知加工意愿或能力的降低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是相关的 (Douglas et al., 2017)。由此可见, 一般阴谋心态似乎应该包含对难以置信信念的普遍易感性。然而在一般阴谋心态的测量中, 这种易感性似乎被忽略了 (Sutton & Douglas, 2020; Sutton et al., 2024)。因此, 一般阴谋心态是否涵盖对难以置信的信念的普遍易感性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论证。如果涵盖, 未来还应该开发更为准确、完善的测量工具。

其次, 将“一般阴谋心态”作为“具体阴谋信念”的潜变量可以解释为什么不同主题的具体阴谋信念之间存在着相关性 (Miller, 2020)。但关于“具体阴谋信念之间存在相关性”这一命题还有一个经典的解释是“单一信念系统”理论 (Goertzel, 1994; Williams et al., 2022)。在单一信念系统中, 每一个具体信念都是另一个信念的证据; 一个受此系统影响的个体相信的阴谋论越多, 就越有可能相信任何新的阴谋论。然而, 这一解释也受到了新的研究证据的挑战。例如, van Prooijen 等人 (2023) 发现, 相互矛盾的具体阴谋信念之间的正相关其实是由于被试同时不相信这些阴谋论造成的。因此, 不同主题的“具体阴谋信念”之间为什么存在相关性还需要更多的未来研究来充分检验。

最后, 根据群际视角划分的内、外群体之间的边界可能还具有模糊性。Jolley 等人 (2018) 发现, 在系统威胁的影响下, 阴谋论使人们将社会问题的

归因从社会系统缺陷转移到社会中少部分“害群之马”的身上。这里的“害群之马”实际上是自己所属内群体中的小群体，虽然他们来自“内群体”，但一旦被人们识别并认定为阴谋的肇事者，人们就会在心理上将这些视为与自己所看重的内群体分离、对立的子群体（Mao et al., 2021）。因此，被识别出来的“害群之马”虽然来自内群体，但已经被人们从“内群体”中剥离出来，不再属于“内群体”。与之相似，在实际研究中，内群体阴谋论经常被定义为指责本国政府或其雇员的阴谋论。从民众自身立场来说，政府及其雇员作为税务标准的制定者，也可能与民众自身的利益相冲突，甚至被部分敌视政府的民众在主观上视为“外群体”。但正如我们在前文所强调的，我们的论点应该涉及更为广泛的群体，这些人群很难将自己的内群体成员身份从自己归属的内群体（例如，作为一个国家的公民，或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等）中剥离出来。因此，在实证研究中，明确被试在多大程度上将主观感知到的阴谋归咎于内群体或外群体将成为首要任务。

上述种种挑战也是对未来更多更深度研究的呼吁。总之，对阴谋论的不同变体进行概念化和区分，可以避免未来相关研究的分歧，澄清和完善我们对阴谋论的理解，防止对“阴谋论”这一核心概念的过度泛化（Nera et al., 2021）。同时，梳理不同“阴谋论”变体之间的联系与差异，也为未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变量框架与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茆家焱, 郭永玉, 杨沈龙. (2021). 阴谋论信念的产生机制——社会认知视角的三种解释. *心理科学*, 44(1), 169–176.
 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 (2019). 信奉阴谋论的动机及干预手段.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7(3), 623–627, 529.
 田彩玉, 茆家焱, 杨沈龙, 郭永玉. (2024). 集体自恋与阴谋论信念的关系及机制. *应用心理学*, 31, 1–18.
 Bertin, P., Marinthe, G., Biddlestone, M., & Delouvée, S. (2022). Investigating the identification–prejudice link through the lens of national narcissism: The role of defensive group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8, Article 104252.
 Biddlestone, M., Cichocka, A., Główczewski, M., & Cislak, A. (2022). Their own worst enemy? Collective narcissists are willing to conspire against their in-group.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3(4), 894–916.
 Brotherton, R., French, C. C., & Pickering, A. D. (2013). Measuring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The generic conspiracist beliefs scal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Article 279.
 Bruder, M., Haffke, P., Neave, N., Nouripanah, N., & Imhoff, R. (2013). Measur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generic belief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across cultures: Conspiracy mentality questionnair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4, Article 225.
 Casara, B. G. S., Suijter, C., & Jetten, J. (2022). The impact of economic inequality on conspiracy belief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98, Article 104245.
 Cichocka, A., Marchlewska, M., & de Zavala, A. G. (2016). Does self-love or self-hate predict conspiracy beliefs? Narcissism, self-esteem, and the endorsement of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7(2), 157–166.
 Cichocka, A., Marchlewska, M., de Zavala, A. G., & Olechowski, M. (2016). 'They will not control us': Ingroup positivity and belief in intergroup conspirac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7(3), 556–576.
 Đorđević, J. M., Žeželj, I., & Đurić, Ž. (2021). Beyond general political attitudes: Conspiracy mentality as a global belief system predicts endors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local conspiracy theories. *Journal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Psychology*, 9(1), 144–158.
 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23). What are conspiracy theories? A definitional approach to their correlates, consequences, and communication.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74, 271–298.
 Douglas, K. M., Sutton, R. M., & Cichocka, A. (2017). The psycholog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6), 538–542.
 Douglas, K. M., Uscinski, J. E., Sutton, R. M., Cichocka, A., Nefes, T., Ang, C. S., & Deravi, F. (2019). Understanding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40(1), 3–35.
 Duckitt, J., & Sibley, C. G. (2007). Right wing authoritarianism, social dominance orientation and the dimensions of generalized prejudic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1(2), 113–130.
 Gkinopoulos, T., & Mari, S. (2023). How exposure to real conspiracy theories motivates collective action and political engagement? The moderating role of primed victimhood and underlying emotional mechanisms in the case of 2018 bushfire in Attica.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53(1), 21–38.
 Goertzel, T. (1994).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15(4), 731–742.
 Goreis, A., & Voracek, M. (2019).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on conspiracy beliefs: Field characteristics, measurement instruments, and associations with personality traits.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0, Article 205.
 Harambam, J., & Aupers, S. (2017). 'I am not a conspiracy theorist': Relational identifications in the Dutch conspiracy milieu. *Cultural Sociology*, 11(1), 113–129.
 Imhoff, R., Bertlich, T., & Frenken, M. (2022). Tearing apart the “evil” twins: A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is not the same as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46, Article 101349.
 Imhoff, R., & Bruder, M. (2014). Speaking (un-)truth to power: Conspiracy mentality as a generalised political attitude. *Europea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28(1), 25–43.
 Imhoff, R., Dieterle, L., & Lamberty, P. (2021). Resolving the puzzle of conspiracy

- worldview and political activism: Belief in secret plots decreases normative but increases nonnormative political engagement.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12(1), 71–79.
- Jolley, D., 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18). Blaming a few bad apples to save a threatened barrel: The system-justifying function of conspiracy theories. *Political Psychology*, 39(2), 465–478.
- Jolley, D., & Paterson, J. L. (2020). Pylons ablaze: Examining the role of 5G COVID-19 conspiracy beliefs and support for violenc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9(3), 628–640.
- Mao, J. Y., van Prooijen, J. W., Yang, S. L., & Guo, Y. Y. (2021). System threat during a pandemic: How conspiracy theories help to justify the system.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5, Article 18344909211057001.
- Mao, J. Y., Zeng, Z. X., Yang, S. L., Guo, Y. Y., & van Prooijen, J. W. (2024). Explaining the paradox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system-justifying beliefs from an intergroup perspective. *Political Psychology*, 45(2), 299–318.
- Miller, J. M. (2020). Do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y beliefs form a monological belief system? *Canad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Revue Canadienne de Science Politique*, 53(2), 319–326.
- Nera, K., Procop, I., & Klein, O. (2023). Comparing the ideological correlates of anti-government and anti-Roma conspiracy beliefs in Romania. *Journal of Pacific Rim Psychology*, 17, Article 18344909231162276.
- Nera, K., Wagner-Egger, P., Bertin, P., Douglas, K. M., & Klein, O. (2021). A power-challenging theory of society, or a conservative mindset? Upward and downward conspiracy theories as ideologically distinct belief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51(4–5), 740–757.
- Silva, B. C., Vegetti, F., & Littvay, L. (2017). The elite is up to something: Exploring the relation between populism and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Swiss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3(4), 423–443.
- Sternisko, A., Cichocka, A., & van Bavel, J. J. (2020).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movements: Social identity, non-conformity, and the lure of conspiracy theorie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35, 1–6.
- Stojanov, A., & Halberstadt, J. (2019). The conspiracy mentality scale. *Social Psychology*, 50(4), 215–232.
- Sutton, R. M., & Douglas, K. M. (2020).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the conspiracy mindset: Implications for political ideology. *Current Opinion in Behavioral Sciences*, 34, 118–122.
- Sutton, R. M., Douglas, K. M., & Trella, C. (2024). Conspiracy mentality versus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232(1), 50–54.
- Swami, V., Chamorro-Premuzic, T., & Furnham, A. (2010). Unanswered questions: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of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 predictors of 9/11 conspiracist belief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4(6), 749–761.
- Swami, V., Coles, R., Stieger, S., Pietschnig, J., Furnham, A., Rehim, S., & Voracek, M. (2011). Conspiracist ideation in Britain and Austria: Evidence of a monological belief system and associations between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differences and real-world and fictitious conspiracy the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02(3), 443–463.
- Tajfel, H., & Turner, J. C. (1979). An integrative theory of intergroup conflict. In W. G. Austin, & S. Worchel (Eds.),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pp. 33–47). Brooks/Cole.
- Tajfel, H. (1982). Social psychology of intergroup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33, 1–39.
- Uscinski, J. E., & Parent, J. M. (2014). *American conspiracy theorie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van Prooijen, J. W. (2020). An existential threat model of conspiracy theories. *European Psychologist*, 25(1), 16–25.
- van Prooijen, J. W., & Acker, M. (2015). The influence of control on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Conceptual and applied extensions.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29(5), 753–761.
- van Prooijen, J. W., & Song, M. D. (2021). The cultural dimension of inter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 112(2), 455–473.
- van Prooijen, J. W., & van Lange, P. A. M. (2014). *The social dimension of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In J. W. van Prooijen, & P. A. M. van Lange (Eds.), *Power, politics, and paranoia: Why people are suspicious of their leaders* (pp. 237–253).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van Prooijen, J. W., & van Vugt, M. (2018). Conspiracy theories: Evolved functions and psychological mechanisms. *Perspectives o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3(6), 770–788.
- van Prooijen, J. W., Währing, I., Mausolf, L., Mulas, N., & Shwan, S. (2023). Just dead, not alive: Reconsidering belief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Science*, 34(6), 670–682.
- Wang, H. Y., & van Prooijen, J. W. (2023). Stolen elections: How conspiracy beliefs during the 2020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changed over time. *Applied Cognitive Psychology*, 37(2), 277–289.
- Williams, M. N., Marques, M. D., Hill, S. R., Kerr, J. R., & Ling, M. (2022). Why are beliefs in different conspiracy theories positively correlated across individuals? Testing monological network versus unidimensional factor model explanations.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61(3), 1011–1031.
- Wood, M. J., Douglas, K. M., & Sutton, R. M. (2012). Dead and alive: Beliefs in contradictory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Psychological and Personality Science*, 3(6), 767–773.
- Zhai, Y. D., & Yan, Z. (2023). Political ideology, ingroup favoritism, and conspiratorial thinking: Patriotism, nationalism, and COVID-19 conspiracy theor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126(4), 1784–1802.

Associations and Distinctions of Multiple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Mao Jiayan¹, Zeng Zhaoxie², Tian Caiyu², Yang Shenlong³, Zhou Haochen⁴, Guo Yongyu²

(¹Department of Experimental and Applied Psychology, VU Amsterdam, Amsterdam, 1081BT)

(²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³Institute of Social Psychology,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710049)

(⁴Research School of Psychology,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Canberra, 2600)

Abstract The "conspiracy theories" that have appeared or been measured in previous psychological studies are not uniform. Goertzel (1994) conducted the first quantitative study of belief in conspiracy theories from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Since then, conspiracy theories have often been interpreted as a homogeneous phenomenon, and are often conceptualized as a "mentality" or a stable personal tendency to "believe that conspiracies will happen". In recent years, more and more researchers have shifted their focus from a "stable" conspiracy mentality to beliefs in specific conspiracy theories. They have often investigated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regarding the content of events in society in the context of real events that have occurred. However,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and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are often conflated as the two most central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y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psychology. Therefore, this paper first makes a detailed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these two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refers to a psychological tendency that individuals prefer to attribute significant events to conspiracy theories, rather than to specific events.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or beliefs in conspiracy theories) refer to the belief that a specific significant (particularly negative) social event is the result of the covert actions of some powerful secret groups. In our current work, we summarize four similarities and five major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In particular, we tease apart different previous measures of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and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Most importantly, we believe that belief in specific conspiracy theories may depend on both the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and the context of the event. It is inappropriate to homogenize various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into a unidimensional menta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and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trend in current conspiracy psychology research to distinguish general conspiracy mentality from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 and to investigate the latter or both in empirical research. In recent years, researchers have categorized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differently when examining their antecedents and aftereffects. Following the existential threat model of conspiracy theories, social identity theory, and evolutionary function theory of conspiracy theories, we propose that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can be divided into two new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beliefs in in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beliefs in out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Examples of beliefs in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can be the struggle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arties in elections or a struggle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terests betwee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can also be consistent animosity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Previou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ingroup and outgroup conspiracy beliefs may arise from different motivational processes, and that believing in ingroup and out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may have different social consequences. These two findings highlight the need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se two variants.

From the theoretical point of view, the existential threat model of conspiracy theor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an "antagonistic outgroup" when sense-making process leads individuals to believe in conspiracy theory. According to evolutionary psychology, conspiracy theories are associated with "hostile coalitions". According to social identity theory, positive social identity is enhanced when people are aware of the superiority of their group over the outgroup, whereas they may take steps to regain ingroup status when their group is in a position of relative weakness, such as believing in conspiracy theories of their opposing outgroup or other powerful outgroups. All of these theories suggest that we need to categorize groups when examining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Moreover,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empirical studies have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conspiracy beliefs and different variables by distinguishing between them. Some researchers have also examined the possible different consequences of ingroup versus outgroup conspiracy theories. Thus, this paper explains the necessity, rationality and demand for re-categorizing specific conspiracy beliefs from an intergroup perspective from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perspectives.

In conclusion, by continuously conceptualizing and refining different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ies, we can avoid disagreements in future conspiracy-related research, clarify and refine our understanding of conspiracy theories, and prevent future research from overgeneralizing this central conceptualization of conspiracy theories. We also admit that there are many doubts and challenges in our current work. However, the relationship and distinc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variants of conspiracy theory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that frames the overall research of conspiracy psychology, so this still needs to be explored in greater depth by researchers.

Key words conspiracy mentality; conspiracy belief; intergroup perspective; social identity; existential threat